

科学哲学与负责任的管理研究

□ 杨 治^①

摘 要：近三十年来，中国管理学不断发展。新时代呼唤管理研究者应担负起对学术和社会的双重责任。本文在徐淑英老师“负责任商业和管理研究愿景”讲话基础上，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了管理研究的方法之争和管理研究的目的之争，并探讨了未来管理学者应寻求的改变之路。

关键词：科学哲学；负责任的管理研究；社会科学

2018年6月，徐淑英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作了关于“负责任商业和管理研究愿景”的演讲（徐淑英，2018），在管理学术圈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呼应了我们这些管理研究者和教育者长期以来关切和争论的一些问题。徐老师演讲内容的核心是希望商学院的研究者在“负责任的管理研究”的指引下（对科学负责和对社会负责），更有效地结合严谨（rigor）与相关（relevance），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事实上，徐老师近些年一直在努力推动这种转变。2015年开始，徐老师先后在北大、复旦、上交开设“管理研究哲学”的博士生课程，2016年开始开设师资培训班，希望现在以及未来的管理研究者能够从科学哲学的高度更深刻地认识这些争论和问题的由来。我有幸在2016年参加了徐淑英老师在北大举办的第一期管理研究哲学师资培训班，从那时候开始接触科学哲学著作和论文，开始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们所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

这两年国内管理学界关于管理学研究的方法及意义存在颇多的争论。从定量定性之争到管理研究的目的意义之争，非常热闹，也发人深省。结合徐淑英老师关于管理研究哲学和做一个负责任的学者的倡议，我们可以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探讨其中的几个问题。

^① 杨治，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一、关于定量与定性之争

我们很多学者可能从博士生开始，接受的就是实证定量研究的训练。学习各类统计方法，学习怎么做假设检验。发表文章的评审过程又在不断强化着这一过程。刚刚进入学术圈的初学者，在研究初期可能是依葫芦画瓢，少有思考为什么这么“画瓢”。因此也出现了很多极端的情况，唯“星号”论，唯“变量”论，招致了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否定，认为目前的实证研究大多不过是变量游戏、统计游戏。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才有了一批学者对我们管理研究方法的一系列讨论，有的实证研究做得非常出色，有的定性研究做得非常出色。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这种从变量到变量的实证研究是无法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问题的。而要创建符合我们所听所见现实的新理论必须回到现实，利用诠释主义的观点，融入企业情境中去观察和提炼。

每种方法背后都有它的科学哲学基础，而方法之争的背后其实也是不同科学哲学的观点之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其与自然科学一样吗？实证主义的方法来源于研究者对外在世界的一个基本假定，即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真实，我们通过大胆假设，并运用各种观察方法不断尝试是否能够否定假设从而建立起最能够解释这个真实的逻辑（Okasha, 2002）。问题在于这种客观真实在社会科学领域真的存在吗（Risjord, 2014）？或者在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真实存在吗？例如诠释主义就认为人是“自我解释的存在”，我们所解释的人的

行为不可能脱离其存在的社会意义（Lee, 1991）。因此最合适的研究方法并不是过滤了所有这些信息的统计检验，而是运用诠释方法描述记录并尝试理解研究对象行为。我不敢说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对，这个争论在科学哲学领域一直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但不论哪个观点，在方法上都有一个共同要求，起码对于一个追求真理的科研工作者而言，方法的严谨性是必需的。IACMR从创会之初到现在，孜孜以求的不是推广实证主义范式，而是一直在力图建立管理研究者的科学精神。徐老师在谈到做一个负责任的学者时，说到了学者要有两种价值观。其中一种就是认识价值观，即关于什么是一个好研究的基本判断标准（徐淑英，2016）。我们所谓的严谨性即源于此。如果所有的学者，不论采取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不论用实证方法还是诠释方法，能够始终遵循科学研究的严谨要求，那么，不论结果如何，这种争论都是有益的。通过争论，认识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这本身就是一个贡献。

二、关于管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我们在管理学院或商学院做研究所积累的知识有用吗？这个本来不应该是个问题的问题，却因为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不断扩大而成为了问题。我也经常自问，花了两三年做出来的研究成果，我到底要从中告诉经理们什么呢？这个反思有时会让人寝食难安。特别是当你作为一个站在讲台上的教授为学生传递知识、为企业

家“指点江山”的时候。这种焦虑困扰了我相当长一段时间，一方面，做研究、写文章习惯性地先去思考理论贡献，而管理应用似乎是最后才去想的；另一方面，如果真有人按照我们研究的结果去实践会不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徐老师倡导做负责任的研究的另一种价值观就是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决定了我们所做研究的相关性，解决了我们关心什么样的问题，引导什么样的社会行为。

商学院或管理学院的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是非常务实的，或者说基本上是以实践为导向的。而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商科为了在大学体系中建立自己的学科领域，才越来越学术化和理论化（徐淑英，2016）。学术化、理论化与实践化冲突吗？严格来讲，它们应该是统一的。好的理论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实践。问题在于当我们过度追求理论化之后，常常忘记了初衷。而好的学者、负责任的学者，应该是从研究问题选择开始就关心我们的研究会影响到谁，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变化。科学家的权威地位使我们肩上的社会责任更大。商学院的学者不会也不应是个例外。

其实带着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去做研究，往往还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和创造。读一篇文章，想想它的理论基础背后有怎样的前提假设，是站在谁的立场和角度来分析问题，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带来的就是颠覆性的理论视角，而我们经常呼唤的创建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正迫切地需要我们去仔细地思考这些问题。通过对比东西方关于管理理论背后的这些隐含假设，并在新的制度、哲学、价值情境下检验这些差异，才会产生根植于中

国特色但对普遍的管理理论产生重要贡献的新知识（Barkema, et al., 2015）。

作为管理研究者和教育者，我们在这个转变的进程中可以做什么？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着手改变的。

第一，期刊的审稿标准和流程。当研究者认识到现有的商学院研究存在的问题时，一个最直接的改变就是，调整期刊的收稿要求以及评审标准。我们看到一些国际期刊在这个方面已经做出了新的尝试。比如战略领域的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SMJ）（Bettis et al., 2016），IACMR 的会刊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MOR）（Lewin et al., 2016）都开始执行新的投稿和审稿政策，强调方法透明、数据开放、结果可重复。特别是两阶段的评审流程（第一阶段只提交研究问题、理论和研究设计；第二阶段报告数据和结果）使得研究的过程更开放透明，接受并发表没有显著结果（比如：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的研究。所有这些努力都在向研究者传递一个信号：我们的研究要经得起检验。期刊的这种变化在目前的制度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向性意义。国内的期刊也在此方面开始尝试。关于期刊审稿，我认为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管理研究同仁们去关注，即同行评议（peer review）。同行评议是学术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安排。虽然近些年中文期刊的评审越来越规范，质量越来越高，但相比世界一流期刊，仍有很大差距。负责任的、建设性的评审意见不仅是对投稿者的尊重，也是对这份职业的尊重。当我们每个审稿人都认真地对待每一份投稿时，一个负责的文化和态度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从一篇小小的文章评审开始，

这种态度会传递给作者，传递给学生，传递给各类评审委员会，最后形成大家共同的认知。

第二，在博士课程中增加对管理研究哲学的教育。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是不可分割的。现在的困惑和争论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将方法论从整个科学哲学体系中割裂出来后产生的。结果是研究本身成了工具，研究者不知道为什么而研究。这样的博士培养体系是有缺陷的。作为研究型的博士教育，科学哲学应该置于方法论之前。最近，我在博士班的“管理研究方法论”课程上尝试将管理研究哲学作为先导知识，安排了4个学时介绍科学哲学特别是有关社会科学的内容，对学生的启发非常大。徐老师在国内几所大学开设的博士生管理研究哲学的课程，反馈效果也非常好。这对教授这些课程的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创造更宽松的环境，深入企业实践，鼓励长期跟踪研究。其实企业对管理知识的渴求非常强烈，对于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管理知识或方案也非常欢迎。问题是我们确实慢慢丢掉了扎根下去做学问的精神和态度，对企业问题浅尝辄止。也难怪很多企业家对我们一些只能发表论文的学者嗤之以鼻。走出“象牙塔”是徐老师这次演讲的一个主题。如果我们能够把做研究的严谨与企业实践结合，对学术、对企业、对社会的贡献都是巨大的。社会学的研究者往往能够为了田野研究跟踪被研究对象几年甚至十几年，从对被研究对象的细致描述和行为观察中提炼独特的理论，而管理学者在这方面能够坚持的寥寥可数。一方面可能因为现在管理学教师的时间非常紧张，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几乎占据了教师所有的时间，很难再有

精力去深入企业实践；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也是因为高校考核体制的原因，不允许长时间不见成果的研究。深入企业实践往往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发现新问题、创造新理论，很有可能不会带来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在以各类指标导向的考核体系下，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者往往很难生存。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应理解管理学科的特点，给予研究者更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研究者自身应该有意识地积极开展与企业的对话交流。现在很多国内会议都增加了企业实践考察环节，为大家牵线搭桥。这是大会主办方认识到实践的意义，有意安排的一种尝试，如果能够捕捉到我们感兴趣而企业又困惑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利用好这些平台，钻研下去。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时代应该是最好的时代，既有国际化开放的学术环境，又处于本土企业转型变革的浪潮中，作为管理研究者有责任和义务为中国发展，也为管理学知识体系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接受编辑：李海洋

收稿日期：2018年8月2日

接受日期：2018年11月9日）

参考文献

- [1] 徐淑英：《商学院的价值观和伦理：做负责任的科学》，《管理季刊》，2016年第1/2期。
- [2] 徐淑英：《负责任商业和管理研究愿景》，《管理季刊》，2018年第4期。
- [3] Barkema, H. G., Chen, X. P., George, G., Luo, Y. D., & Tsui, A. S. 2015. West Meets East: New concepts and theo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

(2), 460-479.

[4] Bettis, R. A., Ethiraj, S., Gambardella, A., Helfat, C., & Mitchell, W. 2016. Creating repeatable cumulative knowledge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 (1), 257-261.

[5] Lee, A. S. 1991. Integrating Positivist and Inter-

pretive 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Science*, 2 (4), 342-365.

[6] Okasha, S. 2002.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Risjord, M. 2014.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